

※余國藩教授榮退專輯※

閱讀寓言 ——評《重讀石頭記》第一章〈閱讀〉

張漢良*

余國藩院士在《重讀石頭記》第一章中引述到薩依德 (Edward W. Said, 1935-2003) 一本早年的書，我認為是被作者後來著稱的東方論述與殖民理論所埋葬的重要詮釋學著作，叫做 *Beginnings*。萬事起頭難，寫小說如何開始？閱讀如何開始？描述余國藩先生如何開始？這個由拉丁修辭學破題 (*inventio*) 所轉化的議題，倒也耐人尋味。

《重讀石頭記》原以英文寫就出版，余院士的英文造詣舉世皆知，其典雅但具高度說服力的文體很難以中文再現。現在李爽學博士花了十年工夫用同樣典雅博學的中文翻譯出來，這種中英語文的雙重閱讀是讀《重讀石頭記》的另外一種的、雙重的「閱讀的愉悅」 (*le plaisir de lire et de relire*)。

在一九八〇年代，重讀 (*rereading, relire*) 這個字眼突然間變成一個口頭禪，這可能反映出七〇、八〇年代各種閱讀理論，包括讀者反應理論、接受美學的流行，以及廣義的歷史主義，或與文本再現有關的新歷史主義的抬頭。和這個口頭禪互為因果、彼此唱和的另一句口頭禪便是：一切文本都是文本互涉的。余院士大作的書名為《重讀石頭記》，他必須回答的首要問題便是：「何謂閱讀？」、「如何閱讀？」在回答這兩個問題的同時，作者還必須說明：「何謂重讀？」、「如何重讀？」作者面臨的問題是一個自我辯護的問題 (*apologia pro vita sua*)。

我們可以有兩種選擇，有兩種開場白；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有兩種開始 (*beginnings*)，來描述余院士，並順便嘗試回答這一切懸而未決的問題。第一種開始落實在余院士寫作的八〇、九〇年代的美國學界，召喚出當時演出的各種與閱讀有

* 張漢良，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關的後結構文學理論，這特定時空交代了余教授書寫的立足點，而這些文學理論的融合——主要包括詮釋學、修辭學、符號學——構成他詮釋的視域和策略 (interpretive horizon and strategies)，透過這些文學理論與紅學，甚至與傳統史學的可能互動，我們或者得以一窺余院士重讀的動機、立場、策略和他的懷抱。接下來我會仔細說明。

第二，我們可以從文類的本體論與知識論來作為開始。小說或西方的虛構 (fiction) 的「存有」(being)，套用帕米耐底斯 (Parmenides) 或柏拉圖 (Plato) 的思路，是靠和它對應的「非存有」(not-being) 所界說的，正如歷史需要非歷史來界說一樣。虛構與史實、語言與真理這四個單元，或兩組二元對立，所構成的辯證關係一開始便落在《紅樓夢》文本世界內的賈雨村（假語存）和甄士隱（真事隱）的人名字謎上；它進一步落在文本世界外的史傳和小說的文類辯證上；最後落在文本世界外屬於後設文本世界的紅學論爭史上。

就紅學研究的歷史脈絡而言，作者的當務之急似乎是回答第二個問題，也就是《紅樓夢》文本所建構的虛實關係，文本世界與外在世界的辯證關係。這些問題的解答使得作者同時回應了傳統索隱派學者——包括現今的趙岡和周汝昌——所強調的歷史真實，同時提出替代性的閱讀方案。余院士把這個課題納入西方和中國史學及史書寫作的傳統來檢視，這一段討論充分表現了作者淵博的學問。從古希臘史家開始一路發展到一九七〇年代以後海登懷特 (Hayden White, 1928-) 等代表的後結構主義史學，在中國方面從《左傳》、《史記》，一直到章學誠的《文史通義》，余博士透過對中西史學的分析與批判，看出歷史知識的建構性、相對性與不穩定性。因此索隱派所索之隱亦非自明的事實，而是受到各種詮釋規範和價值系統，以及語言修辭所干擾的。處身在一九八〇年代的北美學術重鎮，余博士充分吸收並轉化了當代各種文史哲思潮，出入運用自如，不見斧痕，本人拜讀再三，感佩不已。

雖然如此，學術研究貴在切磋琢磨，而非文人標榜或相輕。余院士充分了解歷史相對性使得閱讀無法穩定，作為讀者，他選擇以符號系統為基礎「對文本修辭的回應」，以求在文本與讀者「衝撞」的空間中得到「較佳」閱讀（譯文頁 48）¹。

¹ 我用的是余國藩著，李爽學譯：《重讀石頭記：《紅樓夢》裏的情欲與虛構》（臺北：麥田出版，2004 年），下文稱「譯文」。英文原著則為 Anthony C. Yu, *Rereading the Stone: Desire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下文稱「原文」。

這種閱讀立場無疑是「程式的」(operational)，而非「終極的」(finalist)。我故意借用了另一套術語，以免「形式主義的」(formalistic) 這個字眼讓人望文生義。然而，就在作者論寓言時，他指出：“[T]here is more to the linguistic sign than meets the eye and ear.” (原文頁 4) (語言符號的意義，有許多卻是耳聞目睹所難以察覺的。)(譯文頁 29)。這句話語焉不詳，但可以是雙面的刃。一方面反省符號的內在結構，訴諸感官的符徵 (signifiant) 與其代表的概念符旨 (signifié) 不可分離，因此以語言符號為基礎的閱讀是需要暫時與外在的先驗系統切斷的，這正是我指稱的「程式的」閱讀。然而，另一方面，這句話也可以被常識挪用，也就是誤用，語言符號指涉外在先驗系統，也就是另外的符號，這時候我們已走出符號學的領域，捨棄了符號，處理邏輯語意學的語言 (word) 與客體或實物 (object) 的關係，這才是寓言的終極式閱讀。前一種讀法我稱為 semiosis；後一種為 allegoresis。

余院士沒有明言「附會派」、「索隱派」和「新紅學」是否為寓言式讀法，但第二章和第三章論儒家情欲和石頭的佛道寓意，其實也可稱作寓言式讀法。寓言式讀法是我剛才所謂的終極式 (finalist) 讀法，在認知和操作模式上，和符號運作讀法是本不相容的。就這一點兒而言，余院士和他在芝加哥大學的同事呂刻 (Paul Ricoeur, 1913-2005) 一樣，都具有相當強烈的折衷主義色彩。我在這兒講的是詮釋學和符號學將近半個世紀的傾軋，以及呂刻長時期從事溝通協調的企圖。

這個折衷主義的個案使我們聯想到芝加哥學派源遠流長的博學鴻儒 (erudition, Belesenheit) 傳統，標榜兼容並蓄的期刊《批評探索》(Critical Inquiry)，以及一九七〇年中葉的多元主義論戰。那場論戰席捲了許多批評家，左右翼都有，包括余院士的另一位同事，也就是《重讀紅樓夢》引用的新亞里斯多德派虛構理論大家布思 (Wayne C. Booth, 1921-2005)。(順便插播一句：《重讀石頭記》的〈餘論〉引用另一位新亞里斯多德派理論健將奧爾森 (Elder Olson, 1909-1992) 的詩句開場，說明虛構的弔詭，可見余院士學院認同感之一斑。) 這種立場問題，容或由學術訓練出發，耳濡目染之餘，日久形成信念，師徒相襲，構成堅固的機制 (institution) 與傳統。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選擇左翼立場，如書中引用的耶魯解構學者德曼 (Paul de Man, 1919-1983) 和密樂 (J. Hillis Miller, 1928-)，或右翼立場，如阿布藍姆茲 (Meyer H. Abrams, 1912-)，甚至多元主義立場，如布思，本來無可厚非，因為它屬於倫理學或價值哲學問題。換句話說，是一個以說服為目標與手段的修辭學問題。

余院士的學術至少可以給國內的青年學者兩種啟示。第一，博學鴻儒並非一蹴而幾，需要長期的浸淫與融會貫通。不可諱言的是，國內走這條路的人有限，少數急功好利者或畫虎不類者喜歡掉書袋，搬弄的卻是二手材料，甚至文學手冊上的條目；寫出來的東西淪於人名和術語的堆砌，浮在上面的是夾生的名詞，底下的論據和條理一片混亂黑暗。這也可算是六十自述，或 *apologia pro vita mea*。

第二，余院士的研究方法超越了無聊的國故派與西化派論爭。我們都同意前蘇維埃愛沙尼亞符號學家羅特曼 (Jurij M. Lotman, 1922-1993) 的說法。每一個文化傳統都有它的符號系統，由它所認可的符號 (sign) 和非符號 (non-sign) 構成。余院士面臨的是兩個殊異的文化傳統，由各自獨特的符號網絡建構，他深切體會到個人閱讀的「歷史性」(historicity) (我喜歡稱之為「歷史限制」)，以及作為詮釋背景的、不可避免的「偏見」或噶達美 (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 所指的「事前判斷」。但他努力克服、壓抑他身處的另一文化傳統，也就是八〇年代的強勢的西方文論，而讓文本背後的中國符號系統發出聲音。

為了不占用下一位發言人的時間，並侵犯到他的文本空間，讓我僅舉一例說明，作為結束。討論情欲時，余院士捨棄了時下流行的、在北美和臺灣一再被複製和炒作的、廉價速成的後弗洛伊德、偽拉岡精神分析，作為終極式閱讀（或對號入座）的工具，轉而重建儒家的情欲符號系統。這種嘗試也許會使閱讀的暴力降低，使文本不至淪為德曼所謂的「閱讀的寓言」(allegory of reading)，也許進一步可能淡化「終極式的」或「寓言式的閱讀」(allegoresis or allegorical reading)。這似乎是折衷主義的一條實用主義出路。在這種情形之下，與其說作為比較文學家的余院士在促成西方文論與中國文本跨文化的對話，毋寧說他揭露了中國文化及文本的內在符號系統，並促成了構成系統演化的前後歷史單元之間的內在對話。唯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進一步奢談比較文學以及跨文化研究。我想這是余國藩教授給我們這批比較文學學者最大的啟示。